

二郎神“家”住灌河口

提起二郎神，人们便会想到那个长着三只眼、手使三尖两刃枪、带着细犬、腾云驾雾的神将形象来。但如果有人追问二郎神的“家乡籍贯”，恐怕很少有人回答得上来。

其实，典籍中写得很清楚。《辞海》中注：“二郎神，神话人物。小说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及戏剧《宝莲灯》等俱引用。《宝莲灯》称二郎神姓杨，名戩，为三圣母（华山圣母）之兄，住灌江口。”《西游记》第六回是这样描述的：

仪容清俊貌堂堂，两耳垂肩目有光。
头戴三山飞凤帽，身穿一领淡鹅黄。
缕金靴衬盘龙袜，玉带团花八宝妆。
腰挎弹弓新月样，手执三尖两刃枪。
斧劈桃山曾救母，弹打棕罗双凤凰。
力诛八怪声名远，义结梅山七圣行。
心高不识天家眷，性傲归神住灌江。
赤诚昭惠英灵圣，显化无边号二郎。

这首诗既概括了二郎神的外貌特征、工作简历、社会关系，最后也点明了他的家乡住在灌江。

灌江（或灌江口、灌口）今究竟在何方？有一说法为今响水县陈家港镇东北的灌河口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二郎神家住灌河口更为妥贴。灌河，一称潮河，西

接南北六塘河，东通大海，为天然入海河道，历史悠久，气势磅礴，潮涨如万马奔腾，潮落跌水轰鸣，数里皆闻水响，自古就很有名气。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为淮安人，响水与淮安毗邻。据说，当年吴承恩写《西游记》曾乘舟顺灌河而下，渡黄海至花果山一路实地采访。灌河口与花果山近在咫尺，唇齿相依，吴承恩写到花果山很自然要涉及灌河，于是在《西游记》中便写出了“二郎神大战灌江口”这一段。从传说及史实上看，二郎神家住灌河口更为合理。《西游记》中所说的灌江口与我们这里的灌河口仅一字之差。灌河古称灌江，灌江口即为灌河口。多年来，妇孺皆知，灌河两岸一直流传着二郎神住灌河口的神话传说。事实上，今距灌河口不远的陈家港从前曾叫作“二圣港”，就因二郎神而得名，二郎神称为“二圣”或“小圣”，神通广大，显化无边，他与齐天大圣孙悟空齐名。

据老人说，“二圣港”直到1925年才改称为陈家港。过去陈家港近海还曾建有一座二圣庙，专为供奉二郎神，香火颇盛，清末渐圯，今遗址尚存。我们在《西游记》第六回中还可以找到二圣庙的影子，书中写道：“却说那大圣已至灌江口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，按下云头，径入庙里，鬼判不能相认，一个个磕头迎接”。瞬间，二郎神赶到，撞进庙门，大圣见了，现出本相道：“郎君不消嚷，庙宇已姓孙了”。这座庙宇大概就是写的二圣港的二圣庙。



《西游记》中的花果山就是以连云港市的花果山为原型来写的，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定论。你如果有机会到花果山，就会发现花果山确有水帘洞、天池、七十二洞、猴啼石、八戒石……所见所闻，无不与《西游记》中的神话和典故有关，据此可以推断，“二郎神大战灌江口”确是以现在的灌河口为典型环境来描写的。如此说来，二郎神的“家乡”就在今响水县灌河口，确实是有理有据、合情合理的。（来源：响水政府网）

文艺战士、人民作家

孙石灵

● 史忠霖

孙石灵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，他的曾祖、祖父、父亲三代塾师，而孙石灵也从小学老师、中学老师、中学校长一直做到大学老师，应该算是继承了先人之事业。当然，由于生得多事之秋，比起祖辈，孙石灵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，也更加多姿多彩。

1914年，年仅五岁的孙石灵即进入私塾开蒙。当时新学兴起，次年转入新创国民小学读书。13岁父亲病故，到1924年，15岁的孙石灵高小毕业，考入省立（板浦）第八师范学校。1927年夏，学校因战乱停办，孙石灵回家在响水口当上了小学教员，当时年仅18岁。1928年春，孙石灵考入东海中学高中师范科学习，并在后来当选为学生会主席。1931年，22岁的孙石灵考入上海中国公学。1932年，“一·二八”中日沪战后，孙石灵回乡，在响水口初中任教。这一次时间不长，到了秋天，孙石灵又进入上海暨南大学就读，入学不久，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一边读书，一边进行文学创作。1935年夏，从暨南大学外文系毕业，因成绩优异，获得金牌奖，受到暨大文学院院长郑振铎、外文系主任陈麟瑞及教授龙渝生等的赏识，留校任外文系助教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暨南大学南迁福建。年底，孙石灵到苏北泰州私立成达中学任教。这一年的暑假，孙石灵被抽调到苏北联抗部队主编《联抗报》。1943年春，日伪大扫荡，孙石灵回成达中学任教。也许与教师这一行有缘，1945年秋至1946年12月，年仅36岁的孙石灵任“紫石联合高级中学”（海安高级中学前身）校长，他是联中能同时教英语、国文、哲学三门课的名师。这是政治形势极为复杂的一个阶段，孙石灵任职时间不长，给海安的教育史留下的却是光辉的一页。1948年春，孙石灵任海安工农中学副校长。1949年11月，被调至南通学院任辅导主任。

不断在“学生”、“教师”、“作家”、“编辑”等身份之间切换，从一个方面说明，当时确是乱世，作为一个学子，一切身不由己，偌大中国，已然安放不下一张书桌；从另一个方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出孙石灵追求学问、追求真理的努力与执着，正是这种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的不懈追求，才成就了他的文学和生命的辉煌。

孙石灵一生大多数时间从书斋到讲台，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跋涉四方、一心报国的热血志士。因积极向党靠拢，表现突出，经惠浴宇（时任中共海州四县特别支部宣传委员，后曾担任江苏省省长）介绍，19岁的孙石灵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1年春，孙石灵考入上海中国公学，由于颠沛流离和身陷囹圄，他失去了组织联系，他一边学习，一边努力寻找组织，并最终接上了组织关系，还担任了公学党支部书记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愈挫愈奋的孙石灵被选为公学学生会主席，他积极组织学生赴京请愿，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1932年秋，孙石灵入上海暨南大学就读不久，即加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（简称“左联”）。1941年暑假，孙石灵到苏北联抗部队主编《联抗报》，一干就是近两年。1943年春，孙石灵回到原任教的成达中学。1944年秋，被选为紫石县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、驻委、大会秘书长。1945年夏，出席苏中行政人民代表会议，光荣当选为出席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。是年冬，出席苏皖边区参议会，当选为驻委。1946年，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组淮阴执行小组到苏中，孙石灵奉调至东台做翻译。

孙石灵是一个人民的作家。1931年春，孙石灵创作了著名的《码头工人之歌》。孙石灵把为人民写作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源泉，一生朝着为人民作家的目标而努力着、实践着。他自觉投身革命，为祖国和人民鼓与呼，以手中之笔，博得了青史留名。1953年，他参加了全国第二届文代会，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
孙石灵是一个勤勉的作家。在他逝世后出版的《石灵选集》，共收入他的论文12篇，散文、杂文14篇，小说6篇，戏剧6部。全书虽长达40多万字，但相较于他的全部作品，乃是很小的一部分。在他生前，曾出版过中篇小说《捕蝗者》、独幕剧《我们放开恩怨》、五幕悲剧《当他梦醒的时候》、长篇鼓词《胜利前奏曲》、通讯《不屈的斗争》、散文集《松涛集》等，可谓著作等身。孙石灵用燃烧的生命，生动诠释了一个作家的勤勉和成就的相关故事。1956年4月1日，由于长期在恶劣的环境中超负荷地创作而积劳成疾，他心脏病复发，与世长辞，享年47岁。

1998年8月，家乡人民为纪念这位左联作家、响水籍第一个中国作协会员，建造了“石灵园”，从此，花朝月夕，年年岁岁，孙石灵的半身雕像静静地立在园中，永远地活在家乡父老的心中。（来源：《响水英才》）

响水口战斗

民国28年（1939年）日军从灌河口登陆，占领陈家港和响水口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联合地方武装，与日、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响水口经历了“四进三出”的艰苦斗争。

民国32年（1943年）11月7日晚，新四军3师副师长兼8旅旅长张爱萍率22团、24团、滨海县总队、涟东县总队冒雨奔袭响水口。日、伪军在响水口修筑的工事坚固，北跨灌河，街上大桥两边筑有碉堡，城外东、南、西三面碉堡林立。碉堡外有铁丝网、土圩、水壕。壕宽三丈多、深一丈多。东门、西门、南门均有重兵把守。西圩门外关帝庙以及响水口以西不远处的大王庙、三岔口等地都有据点。驻响水口的敌人，有伪军徐德泰部4个大队约800多人，日军100人。战斗从8日凌晨2时半打响，新四军首先拿下西门攻入西街。伪军从睡梦中惊醒，吓得东奔西跑逃命，有的淹死在水沟里；日军躲在碉堡里胡乱放枪，头也不露。伪军大队长蒲开喜带一部分伪军想往日军驻地躲避，被打死10多人。新四军一部攻击响水口西围

寨，打垮驻守关帝庙的伪保安1团第1大队和独立中队。另一部攻打响水口西的三岔口伪军据点，将伪军逼进几间比较坚固的屋子里。新四军战士爬上屋顶，用手榴弹往屋里扔，打得伪军狼狽不堪。战斗一直激战到下午6时，又先后攻克关帝庙、大王庙、三岔口等据点。8时许，新安镇的日、伪军数百人赶来增援，新四军遂撤出战斗。此次战斗，新四军俘伪中队队长顾晋祥、耿万年、彭益山，副中队长徐子林及以下官兵90多人，毙敌30多名，伤敌40多名；缴步枪170支，驳壳枪4支，战马数匹，自行车2辆，子弹1000多发。新四军伤亡20多人。

民国34年（1945年）9月19日，新四军4师第10旅30团，对响水口伪军徐德泰部发起攻击。新四军指战员突破两道铁丝网后越过三丈多宽、一丈多深的壕沟，冲入市区。伪军弃据点渡灌河向新浦、连云港方向溃逃。这次战斗，共击毙伪军20多人，俘11人，史称响水口第一次解放。

（供稿：县委党史办 王志迁 张耀清）



人民影剧院

● 辛从伟

人民影剧院建设于文革时期的1968年，坐落于现灌河路中段，坐北向南，总体建筑庄严、大气，色彩运用协调，符合中国传统建筑均衡、严整、方正的对称性，将政治寓意、雕塑艺术有机而合理地融合起来，极具时代美感，类似风格建筑现在各地极为罕见。

建筑最上端中间为黄色五角星，两边分列三面红旗。再下方为黄色麦穗和褐色齿轮，寓意着工农联盟，齿轮中间为交叉着的枪支和笔杆子，寓意我党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取得政权。再下方为毛体书法五个红色大字“人民影剧院”。绝大多数老街人已不记得，原本最上方中间不是五角星，而是毛主席头部塑像，人民影剧院大字的下方原为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九个红色黑体大字，1970年2月重新修整时才改为现今的模样。大门两侧墙体为电影放映预告栏，正常一个月放映10部影片。剧场内部设有933个翻板座椅，一个“开”字型走道将剧场分为六大观众区。

电影院成了居民快乐的源泉。那时电影票虽然只有一角钱一张，但当时工资水平极低，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月工资也就30元左右，大多家庭又是单职工，一个家庭四、五个孩子很正常，要精打细算才能养家，拖家带口看场电影并不容易。吃过晚饭的我们，快速地打着“几”字型只有我们小伙伴们才能懂的手势暗语，相约着向影剧院呼啸而去，这个“几”字形形象地代表着我们翻墙头的过程。如何每天能看上电影，是我们少年时期一项重要功课，经过长期总结，攻略有五。一是挤，每场电影进场人多时，硬挤在大家面前，售票工作人员有时验票忙不过来，往往会放我们一马。二是冲，有小伙伴理发时剃成光头，剩剩票口无人进场时，售票员不介意，突然发力，闪电般速度冲进收票口，进场后便如泥牛入海，无处寻踪。当前两种方法行不通时，第三套方案爬墙头便粉墨登场，两米多高的墙头，我们总有各种方法爬上去，最常用的便是架拐，也就是搭人梯，进了放映场，如同进了天堂，那种幸福感无以言表。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，有时刚

跳下墙头，就中了埋伏，被剧院工作人员揪着耳朵驱逐出境，就只好无奈地进入下一方案——拾大麦。每场电影最后约10分钟，电影院门往往大开，准备散场，在外无钱购票的人们往往蜂拥而进，也过一把看电影的瘾。老街人把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拾大麦，如同乡村麦收之后，还有人去拾麦穗一样。最后一招便是义务劳动，当时影剧院有一工作人员绰号叫“张二xx”，另一个是残疾人，绰号叫“郑x子”。因二人在收票处如同哈哈二将，管理严格，所以老街人戏谑地送了这外号给他们，小伙伴们都惧怕此二人。但组织小孩义务劳动往往由张某领头，回报便是第二天晚上免费看电影，虽扫帚时尘埃满室，哈哈大笑，想到明天可以免费看电影，内心还是十分欣喜，干劲十足。

电影院早期主要放映8个样板戏，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小铁梅与杨子荣都是我们喜爱的英雄人物。我们的最爱还有战争题材的影片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，尤其喜爱《闪闪的红星》中的潘冬子。看得时间最早的影片是“四人帮”粉碎后解禁的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。早上六点钟被从那以后一曲《洪湖水浪打浪》唱响全国，响水淮海剧团还根据电影排戏在影剧院上演，几乎场场爆满。1978年后，日本电影《望乡》《追捕》，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红极一时。可以这样说，我们少年时代放映过的影片几乎没有遗漏过，用现在网络名词来说，是个十足的电影小粉丝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，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，尤其是彩电走入千家万户，人们的休闲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，电影院渐渐门前冷落车马稀，进入新世纪彻底关门停业，现在的影剧院外表基本保持原貌，内部已面目全非，改作小商品批发，老街人每每经过时还会不时想起影剧院的鼎盛时代，而现在看上去已像一个家境衰败的破落子弟，是那么的寒酸、黯淡。曾经是响水的标志性建筑，在响水人生活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老影院，如今却渐渐淡出了人们下的视线。

转战中的战地情怀

——徐怡泰烈士遗书赏析

● 刘标

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徐怡泰烈士在转战大江南北的过程中，他的数封战地家书，让我们略到了他的战地情怀。

“昨天我是从黄家闸回来的，离这儿有二十里地。我们的工作是把过去烧毁的汽车，用完好的汽车拖回来修理。那个工作是够艰苦的，要走十几里路的草滩，下面都有水，蚊虫多得很，成群的尾追人。又黑又大，咬起人来特别痛……”这是1948年8月18日徐怡泰写给妻子的信，说的是生活艰苦；而他于1949年6月6日从徐州给妻子的信中，则描述了战争的残酷，“我们住的村子里战争还不算猛烈，但已很残酷了，到现在还有一些尸体给狗吃得支离破碎……”他信中描写的场景，是淮海战役结束一个月后的景象，至今读来仍令人不寒而栗。

此信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，徐怡泰所在部队先后驻扎高邮、扬州、南京，又移驻江西上饶、福建建瓯等地。1950年11月10日，他被抽调到三野后勤复员委员会工作，住南京。转战过程中他时有家书。1950年4月15日在江西上饶写给妻子的信中写道：

“这儿气候较南京温暖多了，农作物较我们家那边生长得快。到这里时麦子已生出了穗，桃花早就开了。有时穿夹衣都觉有点热，但气候是不正常的，有时变得很冷。这儿山很多，我们住的地方还算平原呢，屋后就是一座小山，早上大家都集合在山上跑步，真是别有风味。树木较多，有一种棕树长得很高，老百姓拿它的棕毛做雨衣或床褥，也可说是一种特产。这儿一般的称呼叫老依，依嫂，依妹。男女的风俗较随便，特别是妇女喜爱调情，认为多几个男朋友好显出她的貌美多才，而觉骄傲。老百姓较迷信，这儿从未遭过灾荒，是相当富裕的。他们见我们部队生活还说不差，其实，我们部队生活在北方农村是没有我们高的。老依们的口音不大好懂，听常了也就渐渐的懂了这些。”

这段300来字的描述，风趣、幽默、朴实，对环境、气候、农作物和民俗，都一一作了描绘，读来让我不禁哑然失笑，也更敬佩他的笔下功夫。不知这样的文字，如今的上饶人读到了会做何感想？我想，就是作为现代的旅游广告词，怕也是非常能吸引游客的。

1950年7月24日，徐怡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说：“我们团又从江西上饶移住福建建瓯。这儿四面环山，房屋拥挤，中午闷热难受。奇怪的是蚊虫很少，大概是给太阳晒死了。西瓜据说很多，现街上已有买的了，1000元（旧币）一斤，样子和我们家的差不多。另有一种大橘子叫‘文旦’，很多，长大有小盆大，走在树下不小心掉下来就会打坏头。”此处对当地风物的描写，又是一种风格，比如蚊虫让太阳晒死了、文旦掉下来会打坏头等，特别搞笑。显然，他是故意幽上一默，逗妻子开心。

从徐怡泰的信件中我注意到，自1947年10月6日到1955年1月7日病故，他先后给妻子和兄弟姐妹写了52封信。这些信，现在看来不仅仅是珍贵的文物，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前后那段历史从一个独特的侧面作出的见证。阅读这些信件，我的心灵一次次受到强烈的震撼，也一次次为他生动、有趣的文笔所折服。他的这些文字，犹如一朵朵战地黄花，芬芳四溢，而他的战地情怀，更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

灌河夕照 记者汪正清摄